



社会质量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张海东

# 中国社会质量研究

## 理论、测量和政策

# Social Quality of China

## Theory, Measurement and Policy

崔 岩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社会质量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张海东

崔 岩 / 著

# 中国社会质量研究

理论、测量和政策

## Social Quality of China

Theory,  
Measurement and Polic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质量研究：理论、测量和政策 / 崔岩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5

（社会质量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201 - 0592 - 7

I. ①中… II. ①崔… III. ①社会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3726 号

社会质量研究丛书

中国社会质量研究

——理论、测量和政策

---

著 者 / 崔 岩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杨桂凤

责任编辑 / 谢蕊芬 胡庆英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学编辑部(010)59367159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3.75 字 数：238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0592 - 7

定 价 / 79.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

《中国社会质量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崔岩的博士论文，早就通过了答辩并获得了学位，经过反复的修改，现在付梓出版。我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欣然接受作序。

崔岩博士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有扎实的基础理论训练、较强的统计分析能力和良好的学术素养。以社会质量为题进行博士论文的研究，也是他经过认真思考做出的选择。

“社会质量”的概念及其理论，最早是欧洲学者为了应对欧洲出现的发展问题和制定欧洲发展政策而提出的，但与我国当前发展阶段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有契合之处，主旨都是实行更加全面、更加包容共享、更加注重人的能力建设的发展战略。

社会质量理论最为核心的内涵，就是强调社会发展的整体质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在实践中，也曾出现过度强调 GDP 的增长而忽略其他社会价值的问题，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等。当前，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我国在大力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对发展的考核评价指标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实践中更加注重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要求，但如何制定符合新发展理念要求、符合国情、具有可操作性的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还需要学界进行新的探索。从这种要求来看，社会质量的理念和指标体系，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社会质量的发展评价体系，从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社会

赋权四个方面考察社会整体发展质量。根据社会质量评价体系，在社会经济保障方面，发展政策要能够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提高其就业质量，增强其劳动技能，扩大社会中等收入群体；在社会凝聚方面，发展政策要有助于解决社会凝聚力弱化、社会信任下降的问题；在社会包容方面，要建立良性的社会互动机制，实现社会共享，保证社会公正，达成社会共识；在社会赋权方面，要提高社会成员的自身能力，发挥个体的能动性，增强社会活力，创新社会治理方法。

关于社会质量理论的来龙去脉以及在我国的应用，国内社会学界已做了很多研究，浙江大学的林卡教授和上海大学的张海东教授都为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社会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也有弱点，那就是有不少指标，都是国家的统计指标里没有的，有些还涉及主观评价指标，这就给实际操作带来很多困难。恰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和2015年进行的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就是参照了这一理论框架进行设计的，获得了大量相关的数据。

本书的贡献有这样几点：其一，它把社会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本土化，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了完善和调整；其二，它第一次使用全国调查抽样数据对我国发展的社会质量进行评价，展现了实施新的发展评价体系的可能性；其三，它通过研究和分析，对改进和完善社会质量评价体系提出了具体的路径。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不是简单照搬西方模式，也不是机械复制传统模式，而是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要求，不断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社会质量研究》一书，是这方面的一部扎实的学术探索性著作，相信将有助于推进这方面的研究，促进人们对发展的社会质量的认识，也为国家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学术依据和借鉴。



2017年2月28日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绪论：社会质量研究概述 .....           | 1  |
| 第一节 研究社会质量理论的现实意义 .....         | 1  |
| 第二节 社会质量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         | 5  |
| 第三节 社会质量理论和发展社会学的关联 .....       | 9  |
| 第四节 社会质量理论研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借鉴意义 .....  | 11 |
| 第二章 现有社会质量理论研究综述 .....          | 14 |
| 第一节 社会质量概念的起源和基本界定 .....        | 14 |
| 第二节 社会质量的理论体系 .....             | 18 |
| 第三节 社会质量指标体系 .....              | 20 |
| 第四节 社会质量指标体系之间的关系讨论 .....       | 23 |
| 第五节 社会质量国际比较与本土化研究 .....        | 31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37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社会质量理论本土化和指标体系研究 ..... | 41 |
| 第一节 现有问题的研究意义 .....             | 41 |
| 第二节 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权重问题 .....          | 42 |
| 第三节 数据来源及与欧洲社会质量研究数据的异同 .....   | 47 |
| 第四章 社会质量与社会经济保障 .....           | 52 |
| 第一节 社会经济保障指标的设计 .....           | 52 |
| 第二节 当前我国的社会经济保障情况 .....         | 54 |

|                              |     |
|------------------------------|-----|
| <b>第五章 社会质量与社会凝聚</b>         | 72  |
| 第一节 社会凝聚的内涵                  | 72  |
| 第二节 当前我国的社会信任水平              | 75  |
| 第三节 当前我国的社会价值规范体系认同          | 78  |
| 第四节 当前社会公众的社会价值观认知           | 81  |
| <b>第六章 社会质量与社会包容</b>         | 105 |
| 第一节 社会包容的理论内涵及其与社会质量理论框架的关系  | 105 |
| 第二节 当前我国整体社会宽容水平             | 109 |
| 第三节 当前公众的社会歧视问题              | 114 |
| 第四节 当前公众的社会公平感               | 116 |
| <b>第七章 社会质量与社会赋权</b>         | 122 |
| 第一节 当前我国公众整体社会参与、政治参与的基本情况   | 122 |
| 第二节 当前我国公众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质量         | 125 |
| 第三节 当前我国公众的政治效能感             | 129 |
| 第四节 当前我国公众的政治参与              | 134 |
| 第五节 再论社会质量中社会赋权的重要性          | 140 |
| <b>第八章 社会质量指标的本土化和构建问题</b>   | 142 |
| 第一节 指标的标准化问题                 | 142 |
| 第二节 不同加权方法及综合                | 143 |
| 第三节 社会质量各个指标权重               | 149 |
| <b>第九章 我国社会质量评价与西方社会质量比较</b> | 155 |
| 第一节 我国社会经济保障水平评价             | 155 |
| 第二节 我国社会价值体系和社会信任水平评价        | 158 |
| 第三节 我国社会包容性发展水平评价            | 160 |
| 第四节 我国社会公众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水平评价      | 163 |

|                              |     |
|------------------------------|-----|
| 第十章 社会质量与国家治理、社会建设的关系 .....  | 169 |
| 第一节 社会质量理论作为评价指标体系的有效性 ..... | 169 |
| 第二节 社会质量对我国社会治理的意义 .....     | 173 |
| 第十一章 社会质量理论和实证研究展望 .....     | 186 |
| 参考文献 .....                   | 192 |
| 后 记 .....                    | 209 |

# 第一章 绪论：社会质量研究概述

---

## 第一节 研究社会质量理论的现实意义

### 一 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发展质量问题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经济领域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中国模式”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认可和全世界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主要目标的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人均 GDP 得到了快速增长，从 1978 年人均 GDP 不足 200 美元到 2000 年人均 GDP 超过 800 美元，用 20 多年时间人均 GDP 增加了 600 多美元；从 2000 年人均 GDP 800 多美元增加到 2015 年人均 GDP 8000 多美元，仅用 15 年时间人均 GDP 就增加了 7000 多美元（李培林，2015a）。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国在经济建设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各种社会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幅度提升了公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但是另一方面，出现了公众对社会评价和满意水平不断下降的现象。就我国的国情社情来看，社会信任危机、道德水平下降、信仰缺位等问题，成了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影响了社会整体发展质量的提高。并且，一些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成了制约国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因此, 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什么是有质量的“发展”。如果仅仅以经济发达程度和物质水平来测量发展, 那么从 2003 年起, 我国人均收入就已经超过了 1000 美元, 经济总量达到了 1.3 万亿美元。这从一个侧面说明, 当前我国的经济水平已经能够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温饱需求。然而,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各种社会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 社会问题和矛盾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 社会并没有因为物质条件的改善而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因此, 单纯以经济水平来评价发展水平, 就有可能错误评估社会的潜在风险, 低估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发生的可能性。正如有学者提出的, 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之后, 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的是进入充斥着各种社会风险的“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发展阶段。

换言之,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如果与之相伴的各种社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就可能会导致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积累。同时,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 社会结构也会呈现多元化的特征, 从而使得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因素逐渐增加。而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和提升, 就必然会使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同时,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 社会结构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从而导致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呈现多元化特征。正如有学者指出, 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从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社会的转型阶段。与此同时, 我国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行为规范、社会价值体系都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当前社会的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矛盾的复杂化使得原有的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管理方式不能适应新的现实要求。因此, 治理创新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所以, 要形成更加灵敏快速的社会政策反应机制, 就要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就要加强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 (李培林, 2011a)。

还有学者指出, “中国模式”在过去是指引中国走出贫困、提速经济的重要路径, 但是, 随着世界格局和我国具体国情的变化,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呈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必须对以往的发展模式进行讨论和反思 (李培林, 2011b; 梁波、王海英, 2010; 周晓虹, 2010; 郑杭生, 2010; 江治强, 2011)。面对国内国际环境发生的变化, 有学者分析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例如, 宋林飞 (2011) 认为, 我国现在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后阶段, 迫切需要向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 在这一阶段, 需要提高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协调统筹城市化、信息化建设和生态现代化之间的矛盾, 运用科学决策方法, 协



调各方利益，正确处理社会发展中产生的各种矛盾。王宁（2010）对中国过去三十年的“低成本”发展模式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在他看来，中国的“低成本”模式具体体现为低劳动力成本、低社会福利成本、低产品质量与安全保证成本、低环境污染成本。而这种所谓的“低成本”仅仅是就企业或政府来说的，其直接后果是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高代价”。因此，这种“低成本发展”不能理解为“高效益发展”。虽然低成本发展模式能够在一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这种模式必然会造成大量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并陷入发展困境。所以，要实现中国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政府和企业就必须超越低成本发展模式，实行协同式发展战略。诸多研究在本质上都指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问题。虽然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发展的同时也留下来了大量社会问题和矛盾。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枯竭问题；而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造成了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地区发展不协调问题和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同时，收入增长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不断增加的中产阶层在满足了经济需求后，更多地会在社会领域、精神领域、文化领域、政治领域提出了需求和主张，从而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纵观西方国家历史，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规模社会运动，正是公众在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满足后，对自由平等政治权利方面的要求而引发的社会动荡。

不仅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不能简单地被画上等号，而且如果发展方向不正确，仅有发展速度反而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国内学界通过比较性研究，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例如，郑秉文（2011）通过对国际经验教训的总结，对中等收入陷阱和中国发展道路进行了讨论，对发展方向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全面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诱因，并提出，只有正确把握发展方向，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型，才有可能避免掉进“陷阱”。

## 二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同时，对于发展问题，不能仅仅把评价标准局限在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上，还必须从社会、政治、文化、信仰等各个方面进行评价，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科学准确的结论。就我国当前社会来看，虽然物质生活水平层面提升较快，但

是,在其他方面,尤其是社会生活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在当前社会中,价值信仰缺位是比较突出和普遍的社会现象,社会成员“原子化”倾向较为明显,社会个体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藐视社会利益、群体利益,漠视社会规范,因而使得社会整体难以形成具有较强凝聚力和自我约束机制的有机社会,社会自治能力和利益协调能力都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在这样的社会中,媒体频频曝光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事件体现出社会信任缺位、个体诚信缺失、整体道德滑坡。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转型,个体从传统的“单位制”的约束中脱离出来,但是却没有形成以“社会人”为核心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格局,从而导致个体“原子化”和人际冷漠现象。同时,社会价值观在经济利益冲击下受到了严重的扭曲。在这样的环境下,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往往会使社会价值信念、文化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形态面临冲击而趋于弱化。同时,国民财富分配格局的不合理导致的贫富差距、城乡差异等问题进一步增强了社会离心力;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导致利益阶层分化和固化,从而增加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在讨论和评价我国当前“发展”水平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被普遍忽视了,那就是社会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能力的建设。我国以往的治理结构,基本上是以政府为核心,以单位为纽带的社会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府的力量是社会发展的主导,社会力量较为薄弱,基本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自我治理模式的形成是稳固的社会基础,社会力量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原动力(田国强,2013)。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社会结构的分化及利益群体的重组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形态,以政府为主导的“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当政府作为资源分配者和利益协调者的能力逐渐弱化时,旧有的社会管理模式可能会使社会走向不稳定状态,甚至导致社会矛盾的积累,形成显性的社会冲突,从而阻碍社会健康发展,抵消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因此,在谈到“发展”的时候,其应当包含国家治理理念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要研判社会治理模式是否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需求,以及社会是否具有与社会结构相适应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因此,可以说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应当是良好的社会自治能力,没有成熟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就必然无法应对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复杂社会矛盾的化解和多元社会利益的协调,从而无法维护社会长久的和谐稳定,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仅依靠政府

的社会管理力量，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而与之相对应，如果社会能够形成足够的自治能力，就可以平衡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张力，通过培育社会组织的能动力，协调各方利益、共享社会资源，从而与政府的管理形成互补。同时，社会自治能力的建设不仅能更有效地提升、促进社会的公平公义，而且可以通过社会成员的自组织实现具体微观的社会管理。因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明确的规则，切实保障公众社会参与、政治参与的渠道和效果，才能使公众公正有效地参与到社会公共政策的讨论中，实现各方利益和诉求的充分表达，从而确保政策制定决策的科学性和公平性，真正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进而减少社会摩擦，降低社会风险，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田国强、陈旭东，2015）。

因此，在评价“发展”水平的时候，既不当依靠单一的经济维度来进行评价，也不应当把发展速度等同于发展质量。当我们对一个社会进行整体评价时，如何测量和评价其发展水平，就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换言之，我们需要一个比 GDP 等经济指标更为正确、更为全面的理论和指标体系来评价社会的发展水平。这也正是我们在这里对缘起于西方的社会质量理论进行全面研究和借鉴的意义。

## 第二节 社会质量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 一 欧洲社会质量理论产生的背景

社会质量理论产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欧洲。这一理论能在欧洲发轫并迅速得到学界和政界的认同，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换言之，社会质量理论的兴起与欧盟<sup>①</sup>社会政策整合的推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欧盟形成早期，一些重要的条约，例如《罗马条约》（*The 1957 Treaty of Rome*），仅仅在很小范围

① 1957 年，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在罗马签署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两个条约，即《罗马条约》，该条约于 1958 年 1 月 1 日生效。1965 年，六国签订《布鲁塞尔条约》，决定成立欧洲共同体。1991 年 12 月，欧洲共同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欧洲联盟条约》，通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 年 11 月 1 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盟正式成立。在本书中，涉及欧洲联盟的部分，均统称欧盟。资料来源：欧盟官方主页，<http://europa.eu/european-union/about-eu>。

涉及社会政策问题，而且其出发点还是为了实现成员国内部经济的整合。因此，在这一时期，欧盟社会政策一般都局限在保护和提升工人权益的内容。同时，政策制定者也通常认为，欧盟成员国之间有着较大的社会、政治差异，因此，所谓统一的欧盟社会政策也自然应当仅限于较为特定的就业领域（Geyer, 2000）。然而，随着欧盟经济整合的推进，一些社会问题不可避免地被提上了政策变革的日程，比如工人的自由迁徙的权利，移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就业中性别的无差别对待问题，工人在工作中应当享有的工作环境标准、健康保护标准等（Friso, 2005）。因此，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整合已经不能再仅仅囿于经济领域，更必须在社会政策层面进行新的调整。因此，1961年颁布的《欧洲社会宪章》从更为全面的公民基本社会权利层面规定了成员国应当实现的社会政策底线。

从20世纪70年代起，欧盟的社会政策发展进入了一个缓慢的阶段。虽然欧盟在社会政策领域实施了社会行动计划（1974年），颁布了《单一欧洲文件》（1986年）、《欧洲工人基本社会权利宪章》（1989年），强调系统保护工人权利，在推进经济共同体的同时实现社会政策的一致性，并提出欧盟经济的发展应当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为目的，但是，在这一时期，欧洲国家首要关注的问题还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而社会政策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则成为政策制定者的次要目标。同时，在这一时期，欧洲国家的政策方向也由扶助社会、维持社会稳定转而为发展市场、提升欧洲整体经济竞争力（张浚，2014）。与此同时，欧盟成员国的不断东扩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欧洲社会政策整体发展的难度。一方面，随着大批中东欧国家的加入，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欧盟整体的财政负担加重，国与国之间的异质性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因为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其首要任务还是解决经济、就业等问题，所以欧盟成员国社会政策的一致性预期逐渐降低。正如有学者指出：“经济的考量占据了主导地位，企业的诉求是关注的焦点，而社会需求等因素至多是占据了次要地位……更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层面的‘市场建设’并没有伴随着‘民主建设’……”（张浚，2014）另外，随着成员国政治体制、历史渊源、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差异越来越显著，尤其是随着一些原共产主义体制国家的加入，欧盟在社会政策的价值认同上出现了一定的分歧，因此，统一的社会政策制定的难度越来越高，社会政策趋同的目标也变得更加困难（Falkner, 2006）。

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欧洲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各



种社会问题逐渐显现出来。移民政策、文化政策、宗教政策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欧洲的发展。

一方面，公众社会参与、政治参与水平逐渐降低。例如有研究表明，德国公众参与政治的热情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逐年降低，其中 18 岁到 25 岁年轻人的政治参与热情的减退尤为显著；与此同时，公众参选率的下降也反映出社会整体对政治参与的热情逐渐降低。具体来说，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欧国家中选民的参选率出现了较为显著的下降。例如，法国 1986 年议会选举参选率为 78.5%，而到了 2002 年，参选率则降至 60.3%，其中总统选举的参选率从 1988 年的 84.2% 降至 2002 年的 79.7%。德国议会选举参选率从 1983 年的 89.1%，逐步降低到 2002 年的 79.1%，在 2013 年的选举中，参选率跌至 71.5%。就英国议会的参选率来看，1987 年为 75.4%，到 2001 年则下降为 59.6%。因此，总体来看，自 1990 年以来欧盟成员国民众参选率显现持续走低的情况。

同时，欧洲各国政党的组织能力也遇到了一定的挑战。有研究显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欧洲各国政党的党员数量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其中，英国各政党党员的数量从 1980 年的 170 万名，下降到 2008 年的 50 多万名，仅占登记选民的 1.21% 及人口总数的 0.9%。在 1980 年到 2007 年期间，德国登记党员人数也从近 200 万名下降至 140 多万名，占登记选民的比例从 4.52% 下降至 2.30%。法国登记党员人数也从 174 万名下降至 81 万名，占选民的比例从 5.05% 下降至 1.85%。同时，在过去 30 年间，挪威、瑞典、芬兰、丹麦等国的党员人数下降了 50% ~ 60%，奥地利、比利时和荷兰等国的党员人数下降了 30% 左右。

就公众的满意水平来看，有调研数据显示，以德国为例，在 1991 年到 2011 年的 20 年间，民众对德国民主制表示满意的比例在 50% ~ 70%，在 1997 年只有 45% 的人表示满意，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比例一直维持在 63% 以上，其中个别年份中，这一比例超过了 80%。在不同的欧洲国家，民众对本国民主制运行的满意程度也存在明显的差别。根据“欧洲晴雨表”2012 年调查数据，丹麦、卢森堡、瑞典等国民众的满意率在 85% 以上，法国和德国分别为 69% 和 68%，西欧的平均水平为 59%。而南欧的塞浦路斯、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的民众满意率分别为 41%、38%、27% 和 14%。（张浚，2014）

## 二 欧盟社会政策转型与社会质量理论

正是在上文所述的背景下，欧洲各国的学界和政界对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对社会政策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正如有学者指出，在这一时期，欧盟社会政策逐渐从附属地位向独立地位转变，从1994年欧盟通过的涉及社会政策的白皮书，到1997年通过的关于稳定、增长、就业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再到2000年通过的《社会政策议程》，欧盟逐步厘清了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就业政策三者之间相互影响与制约的平衡关系，欧盟的社会政策也逐渐从附属于经济政策发展到实现独立，从公众视线的边缘位置走向中心；就欧盟整体的政策制定和治理模式来看，政策制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单纯倚重经济政策转向经济、政治和社会政策均衡发展；其社会政策的边界也从保障工人的基本生活条件、工作环境和健康，实现工资平等转向全面拓展社会成员的发展空间和能动能力，从以再分配和消费为导向转变为全面提高社会个体的素质和技能、提升人们应对风险的能力等方面。这都体现出欧盟社会政策在理念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在政策执行理念和执行方式方面力图克服成员国间的差异，促进各国之间的政策趋同（严双伍、石晨霞，2012）。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质量理论会产生在欧盟社会政策转型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欧盟在社会政策转型的过程中，对公平、正义、平等的价值理念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原有的以市场为中心的自由竞争的社会资源组织形态有了一定的修正和限制，更是把有关个体的基本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的保障的政策，重新提到了欧盟社会政策整合的议程上来。在一定程度上讲，提高社会政策的地位、主张以社会质量理论来评价社会发展的核心就是要重新树立“社会”与“国家”、“市场”之间的边界，其倡导的不仅仅是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经济水平的发展，更是注重社会作为有机体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内生的治理能力的建设。而仅有经济的进步还不足以说明社会的进步，经济意义上的发展也不能取代社会意义上的发展。只有全面对社会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才能得出更为准确的结论。因此，可以说，欧盟社会政策转型为社会质量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也正是因为欧盟新的治理体制下，社会政策不再是经济政策的附属，社会质量理论才有了更多的空间，得以在诸多政策领域有其用武之地。

### 第三节 社会质量理论和发展社会学的关联

社会发展问题一直是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重心之一。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的主要命题之一。发展社会学也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发展社会学以社会变迁为研究对象，重点讨论现代化这一现象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发生、发展的路径与过程，并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进行比较。

早期的发展社会学理论基本是建立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之下的，“社会趋同理论”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这一理论认为，现代化进程是所有社会、所有国家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尽管各个国家的现代化时间、路径、模式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总体而言，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必然是经济工业化、人口城市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世俗化。在这一分析框架下，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成了现代化研究的普遍范式。在建立理论模型时，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也被广泛用来检验其他国家的社会发展路径。例如，W. 穆尔提出，现代化就是非西方的“传统社会”向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进行总体过渡和转化，而这种转化不仅仅是组织制度上的，更是价值观和社会意识形态上的转化（富永健一，1993：112）。M. 列维在《现代化的模式和问题》一文中也对西方世界所代表的“现代化社会”和非西方国家所代表的“非现代化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进行了比较，并且指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非现代化社会”向“现代化社会”演变的过程（Levy, 1967）。D. 勒纳在1958年出版的《传统社会的消逝》（*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一书中，阐述的核心观点就是如何利用西方现代化的普适性模型来研究全球的社会发展（Lerner, 1958）。

因此，发展社会学研究的早期阶段充斥着社会进化论的观点，并且把其研究建立在简单的二分式的理想型模型之上，从而得出工业社会必然优于传统社会，而前者也必将取代后者的结论。因此，在早期的发展社会学中，西方式的现代化路径也就成了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同义词，而“现代化”也就被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化”。

同时，在很多早期的理论研究中，更多关注的通常是物质上的积累和经济上的进步。“发展”一词本身也被简单地界定为经济上的发展，对“社会”本